

历代祭祀曹操现象研究

——兼论亳州旧志中的曹操事迹

程 诚

提 要：祭祀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代祭祀曹操的文化现象对于理解曹操形象演变有重要意义。祭祀曹操始于曹魏立国后建立的宗庙制度，在北宋以前基本得到官方认可。南宋以后，曹操形象急剧恶化，不在官方祭祀之列，甚至成为地方官民的忌讳对象。亳州官民不再祭祀曹操，明清亳州旧志对曹操事迹也多有回避，主要原因包括曹操的言行与儒家伦理存在矛盾；曹魏国祚短促，祭礼粗疏，未能形成规范的合法性叙事；受到中国史学盛行的正统论之影响。曹操祭祀的衰落及其在明清旧志中的尴尬地位，表明地方志对历史人物的书写深受国史叙事的影响，这是国家治理地方、影响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。

关键词：曹操形象 帝王祭祀 地方志 历史人物书写

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曹操一直是学界与公众讨论的热点。以曹操形象为例，相关研究非常丰富，主要侧重曹操形象的变迁，文学形象与历史形象的差异，曹操形象的接受情况，历代名人对曹操的评价等方面，很少涉及历代如何祭祀曹操，以及地方志如何书写曹操。^①探讨历代对曹操的祭祀，以及地方志如何书写曹操，对于理解曹操形象的流变有重要意义。综合史料来看，历代祭祀曹操经历先扬后抑的过程。自三国至北宋时期，曹操形象虽有争议，但仍在官方祭祀之列；南宋以后，官方与民间的负面评价合流，曹操不仅不在官方祭祀名单，还受到官方公开批判。受其影响，明清地方志的曹操书写与曹魏遗迹也处于“失落”状态。有鉴于此，笔者拟结合地方志与其他典籍，梳理历代祭祀曹操的具体情况，兼论亳州旧志中的曹操事迹，探讨其中的变迁原因及影响。

一 三国至北宋时期官方致祭曹操

一般来说，古代朝廷祭祖之礼，主要是庙制与祭法。庙制，即列庙次序与亲尽迭毁之法；祭法，即祭祀的时间、规格与配享等情况。延康元年（220），曹丕即位为魏王，追尊祖父曹嵩为太王，父亲曹操为武王。不久，曹丕代汉称帝，改元黄初，“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，考武王曰

^① 参见郭沫若：《谈蔡文姬的〈胡笳十八拍〉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59年1月25日，第6版；翦伯赞：《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——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》，《光明日报》1959年2月19日，第3版；郭沫若：《替曹操翻案》，《人民日报》1959年3月23日，第7版；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编：《曹操论集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1960年；吴云编：《1978—2000年的曹操研究》，《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》，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5—30页；纪德君：《百年来〈三国演义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》，《广州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5年第6期；沈伯俊：《再论曹操形象》，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7年第3期；沈伯俊：《重提旧案论曹操》，《明清小说研究》2010年第4期；李凭：《曹操形象的变化》，《安徽史学》2011年第2期；张检：《曹操形象文学传播研究》，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15年；李同恩：《魏晋南北朝时期曹操形象的演变》，《中州学刊》2018年第7期；姜磊：《曹操杂传与中古时期曹操历史形象的构建》，安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23年。

武皇帝”^①。黄初二年(221),曹丕“以京师宗庙未成,帝亲祠武皇帝于建始殿,躬执馈奠,如家人之礼”^②。由于宗庙尚未建成,曹丕临时在宫殿里,以家人之礼祭祀曹操。南朝学者何承天评价道:“案《礼》,将营宫室,宗庙为先。庶人无庙,故祭于寝。帝者行之,非礼甚矣。”^③

黄初四年(223),曹丕下诏,制定新的宗庙制度。《魏书》载:“有司奏造二庙:立太皇帝庙,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,亲尽以次毁;特立武皇帝庙,四时享祀,为魏太祖,万载不毁也。”^④曹丕将太皇帝曹嵩、曾祖曹腾与高祖曹萌合于一庙,执行亲尽以次毁的原则,只有太祖曹操庙才是万世不毁的。此外,关于祭祀礼仪与时间,曹魏内部也有多次争论。

终曹魏一代,朝廷5次下诏调整配享功臣名单。青龙元年(233),“诏祀故大将军夏侯惇、大司马曹仁、车骑将军程昱于太祖庙庭”^⑤;正始四年(243),“诏祀故大司马曹真,曹休,征南大将军夏侯尚,太常桓阶,司空陈群,太傅钟繇,车骑将军张郃,左将军徐晃,前将军张辽,右将军乐进,太尉华歆,司徒王朗,骠骑将军曹洪,征西将军夏侯渊,后将军朱灵、文聘,执金吾臧霸,破虏将军李典,立义将军庞德,武猛校尉典韦于太祖庙庭”,正始五年,“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”^⑥;嘉平三年(251),“有司奏诸功臣应飨食于太祖庙者,更以官为次,太傅司马宣王功高爵尊,最在上”^⑦;景元三年(262),“诏祀故军祭酒郭嘉于太祖庙庭”^⑧。

以上功臣共计26人,基本囊括跟随曹操南征北战、立有功勋的能臣武将。其中,文臣8人(包括司马懿),武将18人。明显有几位名臣缺席,即于禁、荀彧、贾诩与许褚。于禁曾经被关羽擒获,又投降东吴,不得列入系情理之中;荀彧对曹魏代汉有保留意见,故而不列入;贾诩对曹丕有拥立之功,故而与王朗、曹真、辛毗从祀于魏文帝庙;许褚不得从祀却很意外。裴松之曾经议论:“褚之功烈有过典韦,今祀韦而不及褚,又所未达也。”^⑨许褚跟随曹操二十多年,在徐他谋乱与潼关之战中贴身救主,功劳不可谓不显著。之所以不能从祀,笔者推测可能与许褚后人卷入政治事件有关。^⑩配享曹操的标准主要依据是政治立场、所立功勋与口碑评价。司马懿虽然列入很晚,但地位最高。最后补入郭嘉,实质上当为秉承司马氏之意。

总体来说,曹魏的宗庙祭祀很不健全,不仅没有在立国后第一时间完善祭礼,而且由于曹睿早崩,政权旁落,继而被司马氏篡夺。一直到曹魏灭亡,三少帝如同傀儡,代表国家礼制的宗庙祭祀近乎名存实亡。曹魏祭祀曹操的礼制较为粗疏,弱化曹操的宗法地位,这为后世曹操的历史评价持续走低埋下祸根。

代魏的晋朝表面上奉曹魏为正朔,实际上却有着明褒实贬的意味。以西晋认可的史书《三国志》为例,虽然作者陈寿名义上尊曹魏为正统,但保留了不少曹氏的负面材料。虽然将曹魏帝王列为本纪,吴蜀帝王写入列传,但将三国并立的体例已有隐意。东晋名臣习凿齿是第一个反

① 《三国志》卷2《魏书·文帝纪》,中华书局,1982年标点本,第76页。

② 《三国志》卷2《魏书·文帝纪》,第78页。

③ 卢弼集解,钱剑夫整理:《三国志集解》卷2《魏书·文帝纪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,第298页。

④ 《三国志》卷2《魏书·文帝纪》,第83页。

⑤ 《三国志》卷3《魏书·明帝纪》,第99页。

⑥ 《三国志》卷4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,第120页。

⑦ 《三国志》卷4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,第124页。

⑧ 《三国志》卷4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,第149页。

⑨ 《三国志》卷4《魏书·三少帝纪》,第120—121页。

⑩ 据《三国志》卷28《魏书·钟会传》载,景元四年(263),钟会伐蜀,令许褚之子许仪为先锋,借故将其处死。

对以曹魏为正统的史学家，他创作《汉晋春秋》，以季汉为正统。同时代的孙盛、袁宏对曹操也多有负面评价。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，大量收录曹操的负面事迹，虽然没有明显的否定倾向，但不少曹操负面言行都出自裴注。再如，《世说新语》记载不少曹操野史，曹操出现19次，远远多于同时代其他人物。这些言论都被留存下来，说明非议曹操在晋朝及南朝君臣看来并无禁忌。

司马炎称帝后，“封魏帝为陈留王，邑万户，居于邺宫。魏氏诸王皆为县侯”^①，表面上礼遇曹魏逊帝，实际上予以软禁，不允许陈留王在封地居住，而是监禁在邺城，不得与外界联系。由于失去人身自由，虽然以曹奂为代表的曹魏宗室名义上可以祭祀曹操，但实际效果大打折扣。

至南北朝时期，由于政治的分裂与动荡，罕有祭祀曹操的记载。直到唐朝官方恢复对曹操的祭祀。贞观十九年（645），唐太宗亲自前往高陵祭祀曹操，并撰写《祭魏太祖文》。他将曹操和商代的伊尹、西汉的霍光相提并论，高度评价曹操，称赞他“以雄武之姿，当艰难之运，栋梁之任，同乎曩时，匡正之功，异于往代”，也批评曹操“观沉溺而不拯，视颠覆而不持，乖徇国之情，有无君之迹”，但承认曹操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将曹魏代汉归因于天命转移。^②

《唐会要》详细记载唐代祭祀历代帝王的情况。天宝二年（743），唐玄宗下诏：“历代帝王肇迹之处，未有祠宇者，所由郡置一庙享祭，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。”这次增加祭祀的历代帝王很多，包括秦始皇、晋武帝、隋文帝等，曹操也在祭祀之列，并以“侍中荀彧、太尉钟繇配”^③。唐朝选取配享功臣的标准已经发生变化，选取政治立场较为模糊的荀彧作为曹操的配享。

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，随即下诏要求保护历代帝王陵寝：“按《祠令》，先代帝王，每三年一享，以仲春之月，牲用太牢，祀官以本州长官，有故则上佐行事。官造祭器，送诸陵庙。先代帝王，载在祀典……魏太祖、晋武帝、后周太祖、隋高祖，各置三尸，岁一享以太牢。”^④他规定要按时祭祀先代帝王，并使用太牢之礼，由地方最高长官担任主祭，祭祀器具则由官府供应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宋朝将历代帝王的祭祀分为4个等级，曹操属于仅次于尧、舜、禹、汤等帝王的第2等级，魏文帝曹丕属于第3等级，魏明帝不在祭祀之列。后来，宋太祖又进一步规范历代帝王祭礼，下诏云：“修先代帝王祠庙，每庙须及一百五十间以上，委逐州长吏躬亲点检，索图赴阙，遣使覆检。令太常礼院重定配享功臣，检讨仪相，画样给付……魏武帝以钟繇、荀攸、程昱配，庙在相州。”^⑤

据宋人穆修《魏武帝帐殿记》载，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），宋真宗到亳州朝拜老子，还特地前往魏武帝庙进行祭拜。他看到“容像载严，有焯有耀”，敕令重修增建。^⑥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穆修好友张知白来亳州任职，发现虽然魏武帝庙的塑像依旧存在，但庙内的帷帐却已坍塌，甚至遮蔽曹操塑像的冠冕。张知白深感乡民对曹操的敬畏之心不足，自己出资修缮3座庙宇的帷帐，并告诫乡民要保护好魏武帝庙。^⑦此文不仅记载魏武帝庙的大概陈设与位置，还反映出曹操形象

① 《晋书》卷3《武帝纪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51—52页。

② 参见《初学记》卷9《帝王部·总叙帝王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标点本，第218页。

③ 《唐会要》卷22《前代帝王》，中华书局，1960年，第430—431页。

④ 《宋史》卷105《礼志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标点本，第2258页。

⑤ 王明清：《挥麈录》前录卷1《太祖诏修三代帝王祠庙配享所在》，清嘉庆十年（1805）虞山张氏刻本，第32—35页。

⑥ 参见郑交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《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12《艺文上》，黄山书社，2020年，第398—399页。

⑦ 按照穆修原文的记载，三座庙宇分别为魏武帝庙、魏文帝庙与魏明帝庙。

在北宋时期已有争议，哪怕是在其家乡亳州，曹操庙也香火不旺。穆修之后近50年，张耒游历亳州，作《题谯东魏武帝庙》云：“历数知归禹，乾坤正造周。事商完凤志，传子岂人谋。铜雀佳人恨，西陵拱木秋。千年故乡庙，歌舞荐牢羞。”^① 明确提到官方以歌舞与太牢之礼祭拜曹操。

不过，宋朝对曹操的祭祀一直争议不断。《资治通鉴》关于三国纪事采用曹魏纪年，曾引发不小争议。司马光为此耐心地解释自己不是有意尊曹，而是“非尊此而卑彼，有正闰之辨也”^②。如果不选用曹魏纪年，那么汉晋以来的正统传统就没法书写。当时民间批评曹操的声音很多，乃至市井之人“至说三国事，闻刘玄德败，颧蹙有出涕者，闻曹操败，即喜唱快。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，百世不斩”^③。最终，经由宋徽宗修订的历代帝王祭祀名单将曹操排除在外。^④

概而言之，北宋官方维持对曹操的祭祀，给予基本肯定的历史评价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，如果否定曹操及汉魏禅让，无异于否定赵匡胤接受后周禅让，反倒危及宋朝统治的合法性书写。但由于北宋民间与士大夫否定曹操的趋势愈来愈强，曹操最终还是被移出官方祭祀名单。

二 南宋以后历代帝王祭祀排斥曹操

靖康之变后，南宋政权偏安南方，只好重新论证正统。朱熹对《资治通鉴》选用曹魏纪年强烈不满，创作《资治通鉴纲目》，改以蜀汉纪年，并将曹操称为“汉之篡贼”^⑤。这种说法被南宋君臣普遍接受，曹操的官方评价更趋下行。宋高宗曾经手书曹操故事赐给前线的岳飞，岳飞在复信中指责曹操为奸贼。^⑥ 否定曹操的倾向在南宋时期最终实现官方与民间的合流。哪怕是统治中原地区的金朝、元朝，虽然也有祭祀历代圣王的记录，但这些记录都不涉及曹操。

明朝以前，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主要是在其出生地，少有集中合祭，明朝首开集中合祭历代帝王之礼。洪武六年（1373），“建历代帝王庙于京师”^⑦。朱元璋对此非常审慎，多次下诏调整祭祀名单。洪武二十一年出台最终名单，“遣官祀历代帝王，初历代帝王庙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，凡十七帝，至是，去隋文帝，凡十六帝”^⑧。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，在北京的历代帝王庙竣工，明廷改在北京祭祀历代帝王。明朝严格地秉行儒家伦理的臧否之法，祭祀名单不仅没有曹操，还排除前朝祭祀的秦始皇、隋文帝等人。

清朝入主中原后，延续排斥曹操的官方倾向。清朝皇帝对历代帝王庙祭祀极为重视，按时祭祀不绝，常有亲自致祭的案例。清初制定包括辽太祖、金太祖、金世宗、元太祖与明太祖等在内的21位祭祀帝王名单。康熙六十年（1722），康熙帝诏云：“朕观历代帝王庙所崇祀者，每朝不过一二位，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，或配享其臣而不及其君，皆因书生妄论而定，甚未允当。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，后世之人俱分属其臣子，而可轻肆议论、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？”他认为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太少，规则也有很多可笑之处，祭祀与否都基于臣子妄议，这违反君权至上的原则。只要不是死于非命或亡国之君，都应该列入祭祀名单。不久，继位的雍正帝贯彻康熙

① 张耒撰，李逸安等点校：《张耒集》卷18《五言长律诗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312页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69《魏纪一》，中华书局，1956年标点本，第2188页。

③ 苏轼撰，王松龄点校：《东坡志林》卷1《怀古》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，第7页。

④ 参见郑居中：《政和五礼新仪》卷23《神位下》，清抄本，第416页。

⑤ 朱熹：《晦庵集》卷82《跋·题曹操帖》，明嘉靖十一年刻本，第5878页。

⑥ 参见《宋史》卷365《岳飞传》，第11395页。

⑦ 陈建：《皇明资治通纪》卷6，明末张名振评点本，第420页。

⑧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88，洪武二十一年二月，台北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，1963年校印本，第3350页。

帝遗志，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143位帝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雍正帝依然没有选入曹操，却首次将昭烈帝刘备纳入祭祀名单。^①

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），乾隆帝对入祀名单进行调整。他提出，不能因为帝王在位时间短就否定他们的贡献，此外也不能忽视分裂时代的区域政权帝王，除个别恶名昭著的帝王之外，为确保统绪不绝，一概纳入祭祀。群臣建议增补晋元帝至金哀宗的25位帝王，得到乾隆帝认可，历代帝王庙祭祀人数最终增加到187人。^②于是，在北京的历代帝王庙里，东汉殇帝、冲帝等夭折孩童，唐僖宗、宋理宗等昏庸皇帝，建文帝、崇祯帝等失位之君都被列入国家祭祀，秦始皇、曹操和杨坚等人依然被排除在外。

围绕清廷对曹操的批判态度，有一个小插曲。在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期间，军机大臣于敏中献上家藏珍本《穆参军集》。该书收录《魏武帝帐殿记》，高度称赞曹操功绩，将其与汉高祖、汉光武帝相提并论，称赞曹操“用能建休功，定中土，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”^③。乾隆帝览后，认为穆修该文“奖篡助逆”“大乖于名教”，“岂可使之仍侧简牍，貽玷汗青”，指示要在《四库全书》中删除该文，“以彰衮钺”^④。

以上是历代官方祭祀曹操的演变概貌。明清时期，历代帝王祭祀逐渐健全与规范，这是彰显正统、论证政权合法性、推动文化认同的重要举措。尽管官方多次调整祭礼，极大地放宽入祀标准，曹操依然被排斥在外。由于官方的明确批判态度，曹操的恶名进一步被强化与传播。

三 民间祭祀曹操的消亡及亳州旧志中曹操事迹的落寞

受官方态度影响，地方曹操祭祀在元明清以后逐渐“偃旗息鼓”。据文献记载，历史上各地曾经存在不少魏武帝庙。其一位于濡须口附近，有刘禹锡诗为证：“曹操祠犹在，濡须坞未平。”^⑤万历《和州志》也有载。^⑥其二位于广陵郡，裴邃任广陵太守时，曾经与乡人共入魏武帝庙，讨论帝王功业。^⑦其三位于湖北夷陵，元代唐肃作《毁曹操庙文》。^⑧其四位于四川泸州方山。宋神宗征讨西南叛乱时，连遇大雨，曾经遣使到魏武帝庙祈祷。^⑨其五位于耀州，据乾隆《续耀州志》记载，“堰内东有魏文帝庙，西有魏武帝庙。土人以三月望日赛焉。”^⑩其六位于庐州，嘉庆《庐州府志》载：“魏武庙在州治内，今废。”^⑪其七位于山西，光绪《黎城县续志》载当地有曹操祠与曹宇祠，乾隆年间被县令拆毁。^⑫其八位于湖北枝江，乾隆《枝江县志》有载，后改为三义祠，祭祀刘关张。^⑬其九位于许州，明代邵宝拆毁之，改建为汉愍帝庙，意在以

① 参见嵇璜纂：《皇朝文献通考》卷119《群庙考一》，清光绪八年（1882）浙江书局刻本，第8392页。

② 参见嵇璜纂：《皇朝文献通考》卷119《群庙考一》，第8444页。

③ 郑文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《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12《艺文上》，第398—399页。

④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52《集部五·穆参军集三卷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，第1308页。

⑤ 刘禹锡撰，卞孝萱校订：《刘禹锡集》卷38《历阳书事七十韵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，第577页。

⑥ 参见万历《和州志》卷5《佚祀志》，明万历三年（1575）刻本，第314页。

⑦ 参见《梁书》卷28《裴邃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3年标点本，第414页。

⑧ 参见李修生编：《全元文》卷1764《唐肃二》，凤凰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58册，第68页。

⑨ 参见王象之撰，赵一生点校：《舆地纪胜》卷153《潼川府路》，中华书局，2013年，第3265页。

⑩ 乾隆《续耀州志》卷1《地理》，清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刻本，第20页。

⑪ 嘉庆《庐州府志》卷18《坛庙志》，清嘉庆八年（1803）刻本，第579页。

⑫ 参见光绪《黎城县续志》卷4《补遗》，清光绪九年刻本，第191页。

⑬ 参见乾隆《枝江县志》卷2《建置志》，清内府刻本，第66页。

蜀汉为正统。^①在拆毁魏武帝庙的前后，他还“列孔融、祢衡、杨修、陈琳于旁为四配……于庙左作《司马懿受禅碑》，以嘲操云”^②。把历史上与曹操有过节的人列为从祀，甚至立《司马懿受禅碑》来讽刺曹操，可见明代士大夫对曹操的愤恨。

以上各地祭祀曹操的记载，说明至少明清以前民间曹操祭祀的分布范围较广。除曹操活动过的中原地区，甚至曹操生前从未涉足的西南地区，也有人祭祀曹操。这其中固然有移民文化的因素，但更多地还是因为古人“万物有灵”的世界观。古代普遍存在着对英雄人物的信仰与崇拜，上至历代帝王，下至英雄豪杰，都会有人去祭拜。

然而，各地曹操庙在元代以后普遍经历拆毁与改建，官方有意打压对曹操的崇拜。元人申屠嘉毁夷陵曹操庙，唐肃撰写《毁曹操庙文》记其事，被明清文人传为美谈。其文如下：

操之不臣于汉，天下后世莫不知也。而夷陵独有庙，夷陵之民皆愚邪？夷陵自有庙来，国非一姓，官非一人，而未有毁之者。凡仕于夷陵者皆愚邪？非也。夷陵之民不皆愚，或知毁而不能毁者，力不逮也；仕于夷陵者亦不皆愚，或可毁而不敢毁者，勇不胜私也。虽然，知毁而不能毁，非愚也；可毁而不毁，诚愚也。申屠公以一介吏，独有事于此，视之民则力足以有为，视之官则勇足以胜私，不流于俗，不惑于祸，使愚者骇，不愚者悦，得非伟欤！呜呼！操之鸩张矣，虽毁之不足以诛之，然公之为，亦非以诛操也，欲后世不臣如操者有所惧也。^③

全文歌颂申屠嘉毁曹操庙的行为，表现对曹操的鄙夷，宣扬正统论。由此可知，自从曹操被移出官方祭祀之后，曹操形象持续失去光彩。对曹操的批判，从朝廷上层延伸到地方社会，地方官公开摧毁曹操庙，试图借此倡导君臣伦理，规训臣民信仰。

无独有偶，即使是在曹操的家乡亳州，曹操书写也逐渐落寞。以地方志人物书写来看，曹操书写被持续删改。嘉靖《亳州志》卷3列有《商纪》《魏纪》，将曹魏与商朝同列为具有正统性的朝代。同时，编纂者大段摘抄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的正文，篇幅约3300字，还保留陈寿对曹操的正面评价。^④该书“凡例”称：“亳以成汤肇域，魏武继作，虽瑕瑜不伦，均之帝系也，特详其始末云。”^⑤虽然对曹操有所批评，但依然将曹操作为地方志应该书写的帝王。顺治《亳州志》与嘉靖《亳州志》的曹操书写大同小异，依然设立《魏纪》，保留大段《三国志》原文以及陈寿评语。乾隆三年（1738）《亳州志》卷9《人物志》首列“帝王”，大幅删改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帝纪》，篇幅下降到约770字；还删除陈寿评语，改以裴松之注许子将评语“治世之能臣，乱世之奸雄”为结语，还点出“后人亦以此为定案”^⑥。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“凡例”指出，“帝王自有本纪，例不列郡县志中。盖拟之人物则不伦，同于列传则非礼。”^⑦该书不再单设帝王本纪，而是将其挪到摭史之中，与兵事、祥异等一并书写。该书的曹操传记约850字，篇幅比乾隆三年《亳州志》略多，补充曹操在谯县的事迹。道光《亳州志》、光绪《亳州

① 参见《明史》卷255《邵宝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7244页。一说是魏文帝庙。

② 查继佐：《罪惟录》列传卷10《理学诸臣传》，民国四部丛刊抄本，第4092—4093页。

③ 李修生编：《全元文》卷1764《唐肃二》，第68页。

④ 参见李先芳纂：嘉靖《亳州志》卷3《魏纪》，黄山书社，2018年，第141—145页。

⑤ 李先芳纂：嘉靖《亳州志》卷首，“凡例”，第1页。

⑥ 华度纂，宋效永点校：乾隆三年《亳州志》卷9《人物志》，黄山书社，2016年，第160页。

⑦ 郑交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首，“凡例”，第8页。

志》设立摭纪，均载有曹操传略，内容基本沿袭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。^① 综上所述，亳州旧志对曹操的书写逐渐规范化，不仅篇幅比例下降，而且对曹操的评价趋向克制，尽力避免给读者留下有意褒扬的印象。

除书写的落寞，曹魏遗迹也被有意忽略，亳州地区对曹操的崇拜销声匿迹。据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记载，元代张柔筑亳州城，曾拆毁魏文帝庙与魏武帝庙，“取其材以助工”^②；曹操活动过的东观稼台在明代被改建为大悲寺；西观稼台在清代改为崇兴寺，地方官员称“殿宇巍峨，楼阁耸峙，新成兰若，颇快登临”^③，表达快慰之情。明清官员屡有修缮道教、佛教寺观的举动，但对辖区内的曹操遗迹却视若无睹。甚至亳州旧志编者还将魏武帝庙视同淫祀，批评“荒祠野寺最易藏疾纳污”，如果不是为存档以供后人查勘，这些“祠庙之俚俗妄诞者”本是不该记到志书里的。^④ 在明清时期的地方乡贤祭祀中也没有曹操。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，朝廷制定乡贤入祀标准，“生于其地，而有德业、学行著于世者，谓之乡贤”^⑤。嘉靖《亳州志》、道光《亳州志》所载乡贤祠祭祀名单均无曹操，反倒有曹植。^⑥ 曹操不被列入乡贤，除因身份特殊不符合以上标准，但也有来自官方持批判态度的因素。

此外，清代亳州籍文人的艺文诗作也几乎没有提到曹操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地方文人的社交酬唱，提到本地的名胜、人物是情理之中的事。然而，由于官方对曹操持批判态度，地方官与文人自然也不敢公开歌颂曹操，修缮曹操遗迹更是取祸之途。这也就造成了清代曹操形象跌入谷底，甚至于亳州本地的曹操遗迹也基本湮灭。

四 祭祀曹操现象消亡的因应

对于古代朝廷而言，最重要的国家事务就是战争与祭祀。祭祀不仅是为表达对祖先的追怀与对神灵的敬畏，更是维护社会秩序、强化族群凝聚力的重要手段，是统治者“受命于天”的合法性来源。无论是中央朝廷，还是地方政府，都将祭祀作为重要职责，并在政书典籍与地方志中详尽记载。对历史人物的祭祀与崇拜，代表着一个时代对历史人物的主流评价。

综上所述，虽然有个别后世名人认可曹操，历代对曹操的祭祀争议不断、逐渐停息。随着官方对曹操祭祀的偃旗息鼓，地方上的曹操信仰逐渐不能立足，纪念曹操的遗迹逐渐湮灭，曹操形象日趋落寞。究其原因，似可归于以下三方面。

一是曹操的言行易引起争议，不符合儒家伦理。宋代以后，中国文化逐渐趋向内敛，程朱理学与心学盛行，强调德行修养、轻视实践探索，忽视个体价值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，曹操的反传统性情——洒脱、豪迈、冒险与直率，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容纳。早在东汉末年，曹操杂取王霸儒法的行径已被视为另类，还曾因他对孔融、荀彧、崔琰与边让等名士的处置上引发过巨大争议。尽管古代有不臣之心的名人，但都没有像曹操这样不断被后世提及与评判，最终集众恶于一身。

二是曹魏国祚短促，未能形成有效的合法性叙事。曹魏政权虽然取代四百年一统华夏的汉

① 参见任寿世、刘开等纂，程诚点校：道光《亳州志》卷41《杂志二》，黄山书社，2019年，第831—832页；钟泰、宗能征等纂，李绍义点校：光绪《亳州志》卷19《杂类志一》，黄山书社，2014年，第982—983页。

② 郑交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3《坛庙》，第93页。

③ 郑交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3《坛庙》，第104页。

④ 参见郑交泰等纂，程诚点校：乾隆三十九年《亳州志》卷3《坛庙》，第94页。

⑤ 俞汝楫编：《礼部志稿》卷85《崇祀备考》，清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，第6159页。

⑥ 参见嘉靖《亳州志》卷2《学校考》，第55页；道光《亳州志》卷23《学校志二》，第317页。

朝，却未能实现统一，且文帝、明帝之后即被司马氏篡权，最终被西晋所取代，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三百年的混乱时期。曹魏的国家祭礼粗疏，加之政权旁落，使得曹魏政权未能及时建构起物质与文化上的正统地位，便在历史舞台上匆匆落幕。欧阳修撰《魏论》云：“自秦以来，兴者以力，故直较其迹之逆顺、功之成败而已。”^①他认为，曹魏取代东汉是正常的朝代更迭，既然秦、汉都是正统，那么曹魏必然也是正统。然而，两汉国祚长久，祭礼完备，对汉高祖的祭祀延续数百年，建立较为深入人心的合法性叙事。因此，“汉”成为后世使用较频繁的国号，汉高祖的历史评价一直居高不下。相比之下，祭礼粗疏的曹操历史评价走低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三是曹操不为正统史学认可，官方助推负面评价。饶宗颐曾说：“中国史学观念，表现于史学史之上，以‘正统’之论点，历代讨论，最为热烈。”^②正统论是中国古代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指针，史书是正统论的主战场，符合当时的正统观点，便可以流传，不符合则会被删削。曹操毕竟有篡权之实，违背正统论要求的君臣大义。正统史学的观点渗透到国家施政之中，进而影响国家祭礼，带动民间书写曹操形象的变异。明代成书、广传后世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塑造奸诈的曹操，与仁义的刘备进行对照书写。该书不仅符合正统论的意识形态，而且迎合民间善恶分明的价值理念，在国家意志与地方官民的合力下，曹操最终归于白面奸臣的形象。

结合地方志记载来看，南宋以降，曹操被官方祭祀排斥后，不少地方开始主动毁坏曹操庙，甚至于家乡亳州也不敢公开认可，删减曹操事迹，弃选曹操诗文，毁改曹操遗迹，采取回避的态度。再对比清代亳州花戏楼关帝庙、岳飞庙的香火不绝，可知官方意志对地方文化与历史记忆有着主导性影响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地方民众的历史观。

结 语

历史人物形象变迁，有其复杂过程，不仅涉及官方臧否态度，还有民间价值判断，两者之间存在多种互动。以往研究将曹操形象变迁主要归因于文学作品的影响，遮蔽背后的深层逻辑，存在一些片面性。研究历代对曹操的祭祀，是解读官方态度与民间评价互动的重要切口。伴随着官方祭祀曹操态度的演变，才有曹操负面形象的多重演绎。

明清以后，在官方的提倡下，地方志纂修逐渐普遍化与制度化，成为存史、育人、资政的重要载体。地方志中的关于曹操事迹的记载，折射出官方意识形态对地方书写的影响。相比于明代与清初地方志编者的“自行其是”，清中期以后的地方志编者更加向官方意识形态靠拢，渐以“公论”代替“私论”。地方志承接着官方国史，通过对曹操等历史人物书写的调整，官方规范地方的文化、信仰与记忆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。由此可知，清代地方志的勃兴，虽然表面上是学术的地方化，内里依然是大一统的意识形态。地方志“分中有合”，秉持的历史观与国史一脉相承，内容编排与人物评价与官方规训紧密相关。哪怕明清地方志强调“述而不论”，背后依然延续着正统史学“史论结合”的观点，主要基于官方意志来书写历史人物。史志同源，两者分中有合，明清时期把控纂修地方志的思想倾向，堪称国家意志贯彻到地方治理的有效手段，发挥着其他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（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）

本文责编：杨卓轩

① 欧阳修撰，李逸安点校：《欧阳修全集》卷16《居士集·魏论》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，第282页。

② 饶宗颐：《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6年，第1页。